

工农兵学员评法批儒选辑

(一)

陕西师范大学教学部编

一九七四年十月

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西安市碑林区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陕西师大 中文系 三年级 二班 第四小组 (1)

先秦两汉法家的教育思想

-西安市碑林区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陕西师大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 (27)

先秦两汉法家的文艺思想

-西安市碑林区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陕西师大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 (45)

李 贽

-中文系三年级学员 马鸿贵 (59)

略谈商鞅的农战主张

——读《商君书·农战》

-中文系三年级学员 霍战录 (64)

儒法斗争故事新编

-历史系二年级编写组 (67)
- 商鞅秦庭战甘杜..... (67)
- 桑弘羊怒斥群儒..... (72)
- 曹操坚决推行法家路线..... (75)
- 柳宗元尊法反儒..... (79)
- 王安石勇敢革新..... (82)
- 王夫之厚今薄古的革命精神..... (86)

章太炎绝师反孔..... (90)

《孙子》选译 (两篇)

.....西安坝桥热电厂化学分场工人理论小组
陕西师大中文系三年级二班学员 (96)

《谋攻》..... (96)

《军争》——(节选)..... (103)

李贽作品选注

.....中文系工农兵学员评论小组 (109)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109)

《赞刘谐》..... (113)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118)

科学的真理

——读孙武的《谋攻》篇

.....坝桥热电厂锅炉分场工人理论组
陕西师大中文系三年级二班学员 (122)

掌握主动 机动开敌

——读孙武的《军争》篇

.....坝桥热电厂锅炉分场工人理论组
陕西师大中文系三年级二班学员 (129)

《弟子规》批注

.....西安市百货公司民生百货商店理论组
陕西师大政教系三年级一班大批判组 (133)

《女儿经》批注

.....三原县城关公社西社大队贫下中农理论组
陕西师大学员 曹锡仁 孙皓辉 刘志忠 王继 (167)

《朱子治家格言》批注

.....政教系三年级一班大批判组 (188)

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西安坝桥热电厂化学分厂工人理论小组

陕西师大 中文系 三年级 二班 第四小组

两千多年来，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不仅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也渗透到军事领域。儒法两家的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两种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方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政治上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在军事上也继承了儒家的反动军事思想，疯狂地推行一条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军事路线。因此，在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儒法两家军事思想斗争史，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开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于认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有益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王朝灭亡的两千六百多年中，伴随着儒法两家政治、思想的斗争，儒法两家在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方面也经历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兵凶战危”还是“以战去战”；“去兵去食”还是“奖励耕战”；“厚币结和”还是“兴兵诛暴”；“不鼓不成列”还是“因敌变化而取胜”；

“任人唯亲”还是“唯才是举”等六个问题上。也就是以哪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治理军队，要不要进行革命战争，要不要建立革命武装，要不要坚持反对侵略的抗战路线，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制定战略战术，以及实行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等方面。斗争的焦点是“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斗争的实质仍然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一、“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

儒法两家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反映在军事上，集中地表现为“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

长期以来，儒家为了按照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建立一支镇压革命、维护旧秩序的军队，推行了一条“以礼治军”的黑线。

春秋末期，是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当时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使整个奴隶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儒家的祖师爷孔丘，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提出“军队内有了周礼，军队武功好就”（“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后》），主张用“周礼”来治军，使军队成为维护奴隶制、镇压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工具。他还反复解释说：“只有做到‘克己复礼’的人，才能为没落奴隶主的利益去作战”（“仁者必有勇”）。还说：“如果只有勇，而不以‘周礼’为指导，就会‘犯上作乱’”（“勇而无礼则乱”）。

儒家经典《礼记》一文中还直言不讳地说：“治理军队如果不按‘周礼’办事，军队进行演习就会失去它的教令，军队就会失去它的制度”（“若无礼……用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竭力主张用腐朽没落的“周礼”。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

孔老二的门徒子路由于倒行逆施，被宋国军队围住，打掉了帽子，要杀掉这个复辟狂。他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周礼”，说什么“君子死冠不冕”，戴好帽子，整整衣服，然后才去见周公。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的反动儒家承袭了孔老二的反动治军思想。宋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地主阶级的顽固派代表司马光，公开提出要“以礼为教”，另一个反动儒生胡安国提出要把“三纲”作为治军的根本。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把“克己复礼”作为“座右铭”，每天反复读三次，并说“用兵执政时时不忘”。独夫民贼蒋介石把“仁”作为《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

历代反动儒家为什么把用“周礼”治军看得这样重要呢？汉朝的儒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讲得清清楚楚。他说：“军队，是用来保护灭亡之国，继续断绝的世袭制，挽救乱世消除祸害的。”（“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可见，儒家“以礼治军”的目的就是要把军队变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工具。

与此相反，法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政治上主张“法治”，推行的是一条坚持社会变革，坚持社会前进的厚今薄古的政治路线。反映在军事上，法家主张“以法治军”，就是要把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变法的政治路线作为军队

建设的根本，用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

春秋时法家代表人物、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学家孙武，就主张“以法治军”。其内容就是在军队中立法制、严军纪、明赏罚。

《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述了他“以法治军”的故事。

孙武第一次见到吴国君主阖闾（音何吕）时，吴王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已经读过了。你可不可以小规模地训练一些士兵让我看看呢？”孙武说：“可以”。吴王又问：“训练妇女行不行呢？”孙武又回答说：“行。”于是，吴王在宫中挑了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孙武，吴王亲自坐在高台上看孙武练兵。

孙武把一百八十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姬分任左右队长，又把矛戟分发给她们。孙武对她们说：“吴王让我教你们操练，要知道军令如山倒，令出法随，决不能违背。”接着他向大家讲解了操练的方法，连如何分清左右前后都说到了。部署已定，孙武便“三令五申”（发了三道号令，作了五次反复说明），发出鼓号：“向右转”，那知道宫女们却嘻嘻哈哈，笑作一团。孙武对大家说：“部署得不清楚，军令没有弄明白，将帅应当负责任。”他重新“三令五申”，随着又发出鼓号：“向左转”，可是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不按军令操练。孙武发火了，他板起面孔，对执掌军法的人说：“军令和操练的方法我都交待清楚了，大家还是不照办，那就是队长的责任了，左右队长应受军法的处分！”他喝把左右队长拉出去问斩。这时，吴王在高台

上看见了，急忙派人赶来说情。孙武回答说：“我既受命为将，一切就得照军令军规办事。如果君王的旨意和军令军规相违背，我是不能听从的。”孙武坚决按军法办事，把吴王的两个爱姬杀了，另外挑选了两个人为队长，重新开始操练。这时，宫女们不敢嘻笑了，都小心谨慎地照令操练，前后左右，丝毫不乱。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说：“兵练好了，请王下来检阅，现在指挥她们去赴汤蹈火，她们也不会胆怯了。”

由于孙武推行法家的军事路线，使吴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著名的军事家吴起提出：“刑罚能够统一兵民之心”（心威于形〔刑〕）。

著名的法家商鞅提出：“用法治理军队，士兵就会为社会进步而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使军队成为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实现国家统一的武装集团（“缘法而治军，故军士死节”）。”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不实行礼教，而致力于法治”（“不务德而务法”）。他还说：“有一万辆兵车的国王，只要按照革新变法的思想去治理军队，就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奴隶主贵族，达到统一天下。”（“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暴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三国著名的法家军事家曹操坚持“以法治军”，他曾说过：“吾在军中持法是也”，“礼不可以治军也”，否定了儒家“以礼治军”的反动说教。

法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诸葛亮认为：“孙（子）吴（起）所以能制胜于天下矣，用法明也。”因而他非常重视

军法的作用。他说：“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古时鸣金即敲铎为收兵的信号，“金之不止”，是说听见鸣铎不收兵），鼓之不进（古时击鼓为中铎的信号，“鼓之不进”是指听见鼓响不进兵），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民间流传的《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军事上鲜明的“以法治军”精神。

儒法两家“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的斗争，实质就是建立一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军队。儒家“以礼治军”，就是要建立一支维护旧制度的反动武装，法家“以法治军”，为的是建立一支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武装。历史经验证明，一定的军事路线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并为实现政治路线服务。法家的军事路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战争中一般都能取得胜利，为推动社会前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没有参加中原各国会盟的资格。但是，由于秦国实行了革新变法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由弱变强，战胜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楚汉相争，项羽拥兵四十万，占地九郡，号令诸侯，气势汹汹。而刘邦当时兵力不过十万，由于刘邦实行的是一条坚持革新、坚持统一的法家路线，所以暂时弱小的刘邦，终于打破了貌似强大的项羽，重新统一了中国。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抓军队工作，就是要抓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贯彻。而林彪继承儒家的反动衣钵，妄图搞“以礼治军”。他顽固地提出什么“四好为纲”来代替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他要广大指战员脱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搞什么“创四好，争五好”。

他一面叫嚷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太远”，“已经过时了”，反对部队学习马克思主义，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面在部队强行灌输他那个什么“六个战术原则”，大肆贩卖孔孟之道，赤裸裸地说：“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由此可见，林彪的“政治思想好”，就是要以资产阶级政治取代无产阶级政治，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军旅有礼”，成就地主资产阶级搞复辟的“武功”。可是，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军广大指战员始终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胜利前进。在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林彪想搞垮我们这支军队的罪恶企图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二、“兵凶战危”还是“以战去战”

“兵凶战危”还是“以战去战”，这是儒法两家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观。

儒家站在没落阶级的立场上，发出“兵凶战危”的战争恐怖论，反对奴隶起义的革命战争，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武装夺权，以维护和复辟奴隶制。

法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以战去战”，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战争，摧毁奴隶制。儒法两家完全对立的战争观，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要不要摧毁旧制度。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丘、孟轲是“兵凶战危”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大谈“仁政”、“王道”，反对战争。孔丘标榜自

己“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有人问孔丘，对无道的君王能不能杀掉，他回答说：“为政焉用杀。”

（《论语·颜渊》）当南宫适说到羿擅长射箭，奭（音奥）力能陆上推舟，都没有得到好死时，孔丘称赞南宫适是“君子哉”、“尚德哉”。《孔子家语·观周》一书中写道，以仗暴力逞胜好强的人不得好死。……温良恭敬，慎重于道德，使人羡慕。孔老二读了这段话，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都记住，这段话说得实在而中肯，合理而使人信服。”

孟轲还鼓吹什么仲尼门徒不谈霸道称武的事（《孟子·梁惠王上》）。他还谴责善于兵法善于打仗的人是“大罪人”，叫嚷“善于作战的人要受重刑处罚”（“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对新兴地主阶级摧毁奴隶制、统一中国的进步战争，孟轲恶毒诬蔑为“以力服人”，说这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暴政”（《孟子·离娄上》），竭力鼓吹“军队是凶器，战争是灾祸”（“兵凶战危”），反对革命暴力。儒家的代表狄山，在汉武帝面前说：“不要搞军事行动，抗战是劳民伤财。”汉武帝问狄山说：“好，你说不用抗战，那给你北方一带一个县，一个军营，你能不能守住？”狄山却说：“守不住。”汉武帝又说：“那给你一个镇，你能否守住？”狄山说：“可以。”汉武帝就让他去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叫匈奴把狄山杀掉了。这件事，有力地回答了儒家鼓吹的“仁政”的说教。

西汉儒家们还胡说什么“一场战争之后，几世都翻不过身来”（“大军之后，累世不复”）。他们这些反动说教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要军队，不要战争。

法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表现了鲜明的观点。孙武

在《孙子兵法》一开头就强调了战争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他说：“兵，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的这种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战争手段夺取政权的政治要求，也正是法家的共同主张。

著名的军事家孙臆针对儒家鼓吹的“非战”（反对进步战争）的谬论，提出了“以兵绳之”的理论。《孙臆兵法》坚决主张用进步战争扫荡奴隶制，消灭分裂割据的国家。

商鞅根据“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更法》）的原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思想，主张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

韩非指出：“兵力弱于敌人，国内又很贫穷，这样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兵弱于敌，国穷于内，而不亡乎，未之有也”）。他分析了当时“大争之世”和“多事之时”的形势，进一步指出：“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战争，就不能完成天下的统一”（“当今争于气力”），尖锐地批判了儒家“兵凶战危”的虚伪性与反动性。

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秦始皇，对于法家“以战去战”的思想更是身体力行。他坚决主张用暴力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实现统一。他坚决镇压了吕不韦、嫪毐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叛乱，亲自发动统一六国的进步战争。在关键时刻，他东到陈（河南开封以东），北起邯郸，南至郢（音迎，湖北省江陵一带），三次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促进了战争的胜利。

战争是阶级的产物。自从人类社会分化为阶级以来，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毛主席指出：“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

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革命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在我国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没有法家主张的正义战争，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就不会自行崩溃，国家也不会得到统一。儒家口头上叫嚷什么“兵凶战危”，摆出一副为人民的安宁反对战争的伪善面孔，咒骂革命暴力是“恃力”。实际上他们反对的只是正义战争，对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战争，儒家是狂热地鼓吹、积极支持的。孔老二在他七十一岁卧病不起的时候，听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齐国田成子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了政权，就拼命爬起来去见鲁国国君，再三要求出兵讨伐（《论语·宪问》）。孔老二对奴隶起义更是恨之入骨。他诬蔑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为“盗”。在郑国奴隶主游吉残杀了一次起义的所有奴隶以后，孔老二立即欣喜若狂地叫道：“好啊！对老百姓太宽了，老百姓就要闹事，闹事就狠狠镇压”（“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儒家的二掌柜孟轲，平时装得连杀牛羊都不忍心看，可是，当他一旦看见或听说谁反对“克己复礼”，就马上凶相毕露地主张“征伐”。他说，诸侯一次不来朝见天子就降低官职，两次不来朝见就削减封地，三次不来朝见就发重兵剿灭。这赤裸裸地暴露了孟轲鼓吹“仁政”说教和反对战争的真面目。人民公敌蒋介石把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诬蔑为“匪”，把发动反革命内战，对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说成“仁”，胡说什么“剿匪就是行仁”。就在这“仁”字的背后，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在一九二七年后的三、四年内，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

林彪在战争问题上和一切反动阶级是一脉相承的。他在

那个臭名昭著的大谈政变的黑话中，用儒家的语言，把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都说成是“互相颠覆”、“互相残杀”的政变史，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区分和对待两类不同性质战争的光辉论述。林彪还鼓吹“恃力者亡”，疯狂反对正义战争，反对革命暴力，极力宣扬“和平过渡”、“和平共处”，骂我们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斗绝了”、“骂绝了”，妄图否定和取消我国人民对苏修的斗争，反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在辽沈战役中，林彪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畏敌如虎，消极避战，右倾保守，妄图阻挠解放战争的胜利，延长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充分暴露了他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三、“去兵去食”还是“奖励耕战”

儒家两家在要不要革命武装，要不要发展生产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儒家从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立场出发，鼓吹“去兵去食”，反对革命的武装。有一次，孔老二的学生子贡问孔老二怎样治理国家，孔老二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那么这三项中去掉那一项呢？孔老二说“去兵”。子贡又问：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应去掉那一项好呢？孔老二说：“去食”。极力主张去掉革命阶级的“兵”和“食”。

秦国大奴隶主贵族吕不韦组织反动儒生编写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说：“武器（指军队）是天下行凶的工具”。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西汉儒家的那些贤良说：“秦所以灭亡的原因，是对外防备胡越的入侵而国内丢了政权。所以说，用兵于外，在国内就要垮台，这是战备所造成的祸害”。

法家主张“奖励耕战”，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战国早期的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李悝主张强兵政策。他在魏国，实行了一套建设武装力量的制度。士兵的选择，都有严格的标准，身穿三层护身的甲，使用重量达十石的弓，背着五十支箭，还要背上长矛，带上盔，带上剑，携带三天的干粮，一天内跑一百里路。达到这个标准才算考中了，可以免除他家的徭役，并且赏给他好的田地和住房。李悝在魏国实行“耕战”的结果，不但练出了强有力的军队，而且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加强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加速了奴隶制经济的瓦解。

吴起在楚国变法时，从“要在强兵”的理论出发，下令加固城都，巩固防卫。他面对反动儒生诬蔑“以战去战”是“好用兵器”，“阴谋道德”（《淮南子·道应训》）的疯狂叫嚣，毫不动摇，坚持了法家的军事路线，使楚国军事力量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位。

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家重视农战，就不容易被敌人攻破，一定会兴盛起来，依靠儒生们的游说，就容易被敌人攻破，就会亡国）。他还应用“耕战”的思想，重农抑商，招民垦荒，奖励耕战，以壮大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这样的结果，打破了秦国陈旧的上层建筑，使秦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

韩非认为，发展农业和加强武装力量是巩固地主阶级政

权的根本办法。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都贯穿着“耕战”精神。他鲜明地提出：“要使国家富强，就得发展农业；要抵抗敌人，就得加强军队（“富国以农，距敌恃卒”）”，把法家的农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西汉时杰出的法家桑弘羊提出“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坚持“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的屯边政策，并且坚持了盐铁官营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打击了工商奴隶主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从而保证了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战争的胜利。

曹操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法家“以农治国”、“兵农合一”的耕战政策的思想，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针对当时土地荒芜、人民死亡的局面，实行屯田制。他把流离失所的农民组织起来，按不同的编制，在公家土地上进行生产。除了民屯，还进行军屯。由于曹操执行了耕战政策，很快地恢复了他所统治地区的农业生产，一年得粟万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足食足兵，保证了曹操进行的统一战争。

诸葛亮也非常重视富国强兵的问题。他承袭了早期法家的“重农”思想，主张“唯劝农业，先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他主张发展生产，多积财富，丰年不要奢侈浪费，歉年也不必太苛薄，平时要有储备，以防灾益。就是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利用战争的空隙，“休士劝农”。在前线涪滨，分兵屯田，在国内设有督农之官。由于诸葛亮的“重农”，当时蜀国出现了“田畴辟，仓廩实”的繁荣景象，在魏国强有力的威胁面前，保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儒家在面临新兴地主阶级起来造反，反动阶级的政权即将覆亡的情况下，提出“去兵去食”这一反革命策略，实质是反对和瓦解革命的武装，不要革命阶级用武力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但他们不是去掉所有阶级的“兵”和“食”，对反动阶级的“兵”和“食”他们是积极支持的。当年孔老二一面高唱“仁义”经，一面使其弟子堕三都。后来的一切反动阶级无不如此。正象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指出的：“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主张把我军“统一”到蒋介石那里去。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大谈和平，胡说什么“中国的和平方向是确定了的，东北的和平前途也是确定了的”，鼓吹大小仗都是“和平前夜最后一战”。在国民党的举国进攻面前，他还幻想和平，“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主张走议会道路，把人民解放军交给国民党，实现“国军化”。一九六一年他与苏修一唱一和，鼓吹“和平过渡”，竭力反对毛主席关于“全民皆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反对革命暴力。他鼓吹“民兵过时论”，“民兵无用处”，破坏我军的战备。而他暗地里却拼凑“大小联合舰队”，妄图搞反革命武装，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林彪及其死党的阴谋活动是永远不能得逞的，其结果，比历史上的反动派失败得更惨。

四、“厚币结和”，还是“兴兵诛暴”

儒法两家在军事思想上的斗争还反映在对侵略者的态度